

武汉近现代工业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研究

季岚^{*1}

(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湖北武汉 430023)

【摘要】: 武汉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遗留下的丰富的工业遗产是城市生产、生活、技术及人文精神的生动写照, 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资源。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武汉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一种新的路径。从武汉城市发展的价值定位出发, 引入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解析以及实现方法, 初步构建武汉工业遗产文化生态学系统。在明确工业文化内涵和尊重地域特征的前提下, 运用文化生态系统的分析方法, 提出以整体保护、多样共生、动态平衡及文化生态格局建设为技术突破点, 实现武汉工业文化遗产基因在历史环境变迁过程中的准确延续传承与合理再利用, 打造武汉工业文化生态特色。

【关键词】: 工业遗产; 文化生态系统; 保护; 再利用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 (2017) 03-0063-06

工业遗产是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新类别, 也是城市文化空间建设的重要构成因素。工业遗产的整体风貌代表着地区工业发展的时代特征, 反映了城市工业生长的脉络。武汉作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和内陆地区重要的老工业基地, 在洋务运动时期、民族工业发达时期、苏联援建中国时期、三线建设时期都留下了种类和数量丰富的工业遗产资源。^{[1](p94)}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城市功能布局调整及产业结构升级, 使武汉工业遗产遭受到很大程度地破坏, 其结构体系、物质空间和人文空间正经历着由时代变化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 遵循科学发展观思想, 结合文化生态学原理, 系统地分析武汉工业遗产特征, 全面认知城市诸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武汉工业文化生态系统, 探索科学可行的保护与再利用方法, 促进工业文化健康发展, 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

一、武汉工业遗产的相关研究

(一) 武汉工业遗产的特征。

1. 历史特征。从历史沿革来看, 1860—1990 年间, 武汉由工业重镇演变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形成了完善的产业结构, 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资源。武汉工业遗产可划分为近代和现代两部分: 近代工业遗产包括 1860—1949 年期间由外商工业、官办工业、民营工业为主体创建的工业遗产; 现代工业遗产包括 1949 年以后建设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工业全面建设时期的工业设施。在此期间, 1958—1964 年, 武汉开辟了武东、青山、余家头等十三个工业密集区; 1965 年, 各工业部门众多经济技术指标均创造建国以后最好水平, 武汉形成向重工业倾斜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格局特征; 到 1986 年, 武汉工业整体规模排全国第四, 仅次于京津沪地区。2. 类型特征。1949 年以前, 武汉近代工业类型单一、产业结构缺陷明显, 工业水平十分落后。建国后 30 多年内, 随着生产力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 武汉逐步形成以冶金、机械、纺织为三大支柱产业, 食品、化工、电子、轻工、医药、建材等行业初具规模, 高新技术开始萌发的门类相对齐全的产业格局。3. 物质载体特征。遗

¹ 作者简介: 季岚 (1980—), 女, 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6Y089)。

产建筑包括有生产厂房、货物仓库、能源设施、企业办公、职工宿舍、车站码头、铁路等，类型丰富，风貌完整。4. 空间分布特征。近代工业遗产多呈散点状分布于内城区的沿江地带，而现代工业遗产则多聚集成片，呈组团状分布于沿江、铁路、城市主干道地带。

（二）武汉工业遗产的价值。

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点战略之一，即传承历史文化，守住城市根脉，留存城市记忆。近现代工业遗产对武汉而言，既是历史文脉的体现，也是城市精神与性格的象征，具有宝贵价值。具体分析，武汉工业遗产有以下五种价值：1. 技术价值。工业遗产记载了武汉工业发展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成果，是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历史沿革的见证，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化。2. 历史价值。工业遗产见证了武汉工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近现代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不平凡的革命性转型和重要历史人物都与工业化密切相关。3. 社会价值。工业遗存是市民的集体记忆，也是社会不同阶段生产生活方式与组织形式的留存，承载着人们对武汉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兼具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教育和公证作用。4. 经济价值。工业遗址大多集聚于武汉城区内核地带，区位条件优越，具备突出的潜在附加值（如图 1，图 2）。工业建筑大跨度、大空间的特征为再利用提供了多种可能，可减少大拆大建带来的资源浪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5. 美学价值。工业建筑的特殊造型、色彩、体量以及形成的城市肌理，对城市景观环境具有视觉、文脉等方面稀缺性的审美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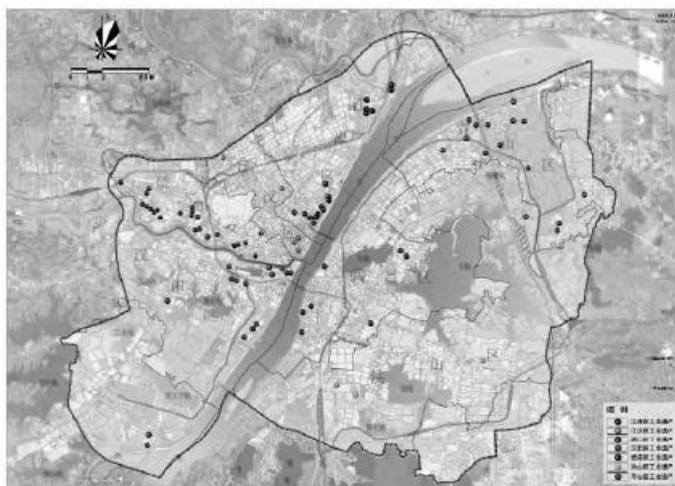


图 1 武汉近现代工业遗产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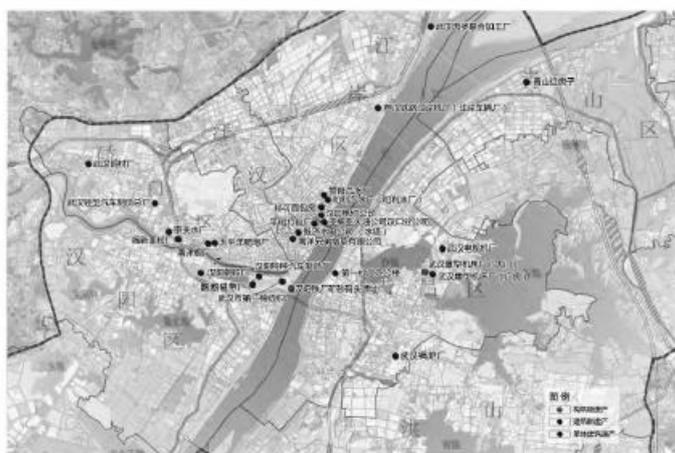


图 2 武汉工业遗产名录遗址点分布图

（三）武汉工业遗产保护现状调查。

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概念尚未形成,工业遗存的改造实践活动大多处于自发性状态,保护效果参差不齐,缺乏科学理论指导。我国对于工业遗产的理论研究始于 1990 年代中后期,一批国内学者开始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保护经验,针对我国工业遗产的价值、分类及改造方法等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与思考。2006 年国家文物局颁布《无锡建议》,正式启动我国城市工业遗产专项保护实质性工作。武汉市政府从 2008 至 2010 年,组织开展了工业遗产专题研究活动,并于 2012 年由武汉市国土规划局编制完成《武汉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在 7 个中心城区范围内确定了工业遗存 95 处,进一步研究制定了武汉工业遗产评定标准,推荐了 29 处工业遗产名单并制定相关保护图则,形成了对主城区控制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的工业遗产保护专项指导(见表 1)”。^{[1](p95)}至此,武汉工业遗产保护在宏观层面上被纳入城市可持续发展框架,在中观层面上开展工业区历史地段保护,在微观层面上确定代表性工业遗产名录。武汉工业遗产保护工作迈进了一大步。

表 1 武汉市首批推荐工业遗产名录

级别	数量	名称	保护与利用模式	分级保护
一级	15	汉口既济水塔、邦可面包房、南洋大楼、汉口电灯公司、和利汽水厂、赞育汽水厂、亚细亚火油公司、平和打包厂旧址、宗关水厂、福新面粉厂、汉阳铁厂矿砂码头旧址、第一纱厂办公楼旧址、武汉重型机床厂(大门)、武汉轻型汽车厂办公楼、汉钢转炉车间旧址	严格保护(文保单位、优秀历史建筑)	以保护为主,充分尊重历史特征,对建筑原状、结构、式样进行整体保留,不得随意拆除,应在合理保护的前提下进行修缮
二级	6	武汉肉联联合加工厂、武汉铜材厂、青山红房子、南洋烟厂、武汉重型机床厂(厂房)、鹦鹉磁带厂	适度利用(城市开放空间、博物馆纪念展示馆、创意产业园、商业综合开发等)	严格保护建筑外观、结构、景观,可做适应性功能改变,再利用需与原有所精神兼容,不宜作大规模商业开发
三级	8	太平洋肥皂厂、武汉第一棉纺织厂、江岸车辆厂(芦汉铁路江岸机厂)、汉阳特种汽车制造厂、武汉锅炉厂、武汉电视机总厂、武汉绒印厂、武汉市毛纺织厂	适度利用(城市开放空间、博物馆纪念展示馆、创意产业园、商业综合开发等)	可加层或立面装饰,尽可能保主要特征,实现工业特征与现代生活有机结合。可增加现代设施,赋予新功能

笔者通过对主城区工业遗产名录中遗址点的实地走访发现,武汉工业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在政策法规层面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保护资金来源短缺,目前只能勉强选择典型性工业遗产进行保护,保护范围有限,遗产信息碎片化严重,工业文化系统性缺失。此外,工业遗产在保护的内涵与外延、保护的理念与范畴、实施的路径与技术中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简单粗暴地对待工业遗址,只注重土地利用经济价值,忽视地域文脉的传承;重视单体工业遗产的空间及文化特色塑造,忽略遗产点之间上下游生产关系的构建等。其中最突出的是工业文化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间信息流、物质流与能量流循环的失衡,造成工业文化危机,工业遗产再利用模式严重雷同,商业化泛滥。

二、文化生态学理论概述

1. 文化生态学与文化生态系统。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新兴学科，以生态学为主要方法的文化学，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是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2](p1)} 文化群落是“由具有衍生联系的多种文化或一种文化中多种文化要素组成的文化有机复合体”。^{[3](p121)} “文化生态系统可以理解为由文化群落及其所在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构成的复杂有机统一体”^{[4](p313)}，其中各个因素受制于整体又牵制整体，对外界条件的变化能做出积极反应，来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和同一性，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

2. 文化生态学的实践性。

文化生态学的价值在于实践性和应用性。它能够科学指导文化建设，完善文化生存和发展条件，合理配置文化与环境资源，优化文化层级结构，促进文化进步和健康发展。文化生态学的功能体现在系统、资源、环境、状态以及结构五个方面。第一，文化是一个普遍关联的整体系统，文化各个因素的存在和发展是在联系中得以实现并相互作用。文化系统内部存在不同的等级和层面，大系统可拥有若干小系统。第二，文化资源既有有形资源，又有无形资源；既有历史资源，又有现实资源。文化资源具有地域性、传承性、不可再生性、共享性以及创新性等特征，它们的价值在于积极使用，使用的越多就越得到保护。第三，文化的生态环境不仅要研究文化系统与外部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有机互动，也要研究文化内部各种不同文化要素之间及与文化整体的互动关系。第四，文化生存状态是衡量、评价和预测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标准。文化生态平衡是一种相对于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动态平衡，并具有主体性，可运用社会规律进行人工干预。第五，文化生态结构由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组成，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化结构的搭建应“以主流文化引导大众文化，以精英文化提升大众文化，以大众文化滋养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文化生态的健康互动”。^{[5](p67)}

三、武汉工业遗产的文化生态属性

武汉老的工业基地、工业建筑、工业设施及工业技术等因各种原因废弃但仍有留存价值的部分，成为城市生产、生活、技术及人文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复合结晶，是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资源。武汉的工业文化自身即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的产生、演变与武汉的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经济水平等因素紧密相连。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决定并形成了丰富的工业文化类型及众多的工业文化要素，不同类型的工业文化及文化要素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的工业文化群落。武汉工业文化生态系统可以看作是由工业文化生态子系统构成，即大规模工业风貌区（如江岸区老租界工业遗址区）；工业文化生态子系统由各个工业文化生态单元组成，即各工业文物保护单位（如汉阳特种汽车制造厂）；工业文化生态单元是由各种工业文化要素产生，如工业历史建筑（如第一纱厂办公楼）。文化生态系统的特殊功能是文化信息流、调节规范功能、社会与人的发展功能等。基于文化生态学属性构建的武汉近现代工业遗产保护系统，能科学有效地整合遗产保护对策，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的再利用方式，促进人、环境及工业文化之间的平衡发展。

四、武汉工业遗产文化生态系统的建设途径

1. 构筑工业遗产产业链，注重工业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原真性保护。

依据文化生态学的系统观，工业遗产各因素具有的价值，只有置于一个整体的框架之中才能得以凸显，加强个体因素之间的文化联系，才能避免遗产信息碎片化及缺失。武汉工业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就是要以多个相互联系的工业遗产点作为保护对象，基于时间与空间结构，从全局的角度研究武汉工业的历史阶段特征、行业类型特征及空间分布规律，通过纵横向地宏观规划将分散的遗产点关联起来，编织成具有复合维度的网状保护系统。构筑武汉工业遗产产业链是整体性保护的有效实施途径，将原本相对孤立的遗产点基于行业的层次结构、上下游生产关系以及相互价值交换等内在逻辑联系，建立起环环相扣的链条式关联。在此框架下，深入考察单个遗产点在产业链演变过程中的突出地位与重要作用，并结合城市肌理层面理解遗产点

在武汉城市空间生长过程中的空间区位和历史定位，进而明确与深化其历史价值，针对性制定保护措施并落实在保护技术中，提升工业遗产区的文化整体价值。同时，工业文化生态系统还应注重原真性保护，工业遗产作为历史证据的真实性是其稀缺性价值认定最关键的部分。对工业文化载体的维护不仅应涉及对工业厂房、历史街区等生产性设备与格局环境的保护，还应应对相应的具有历史文化、建筑美学价值的生活性空间环境加以保护，将保护范畴扩展到对原真性生活形态的维护。

在实施方法上，应重视利用 GIS 技术，通过登录制度建设详尽的武汉工业遗产数据库，切实记录工业建筑及重要工业区，保存城市历史风貌、空间肌理资源清单。在大数据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武汉工业遗产的形态及分布特征，制定动态保护法则，确保工业遗产的结构、空间和环境都保持原真性。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方法，修复消失的代表性遗存点、清理文化线索、整合区域肌理，构筑工业文化产业链，落实整体性网络保护思路，确保工业遗产信息的完整性。特别在旧城改造中，面对再开发用地范围内的工业遗存需要慎重考量，可使用 GIS 来分析基地现状条件和规划目标，并利用 GIS 地图和 GPS 测量来计算更广区域内的土地使用状况和环境特点，结合工业遗产专项保护法则判断开发用地的新功能是否合法。工业遗产需根据开发用地的合法建设目标确定再利用方向及模式，切实做到保护先行、开发在后，强调保护与开发的协调。

2. 维系工业文化的多样与差异，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环境的开放性。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是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能促进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文化的趋同和粗陋会导致文化危机甚至经济滞后。因此，武汉工业遗产保护应努力维系工业文化物种的多形态共生，鼓励异质工业文化因素的共存并积极使用，为它们留足发展空间份额。同时还需促进不同类型工业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与融合，积极营造兼和共荣的生态环境。赋予工业文化生态系统强大的生命力，还需注重保持工业文化环境的开放性，加强与社会其他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以及自然资源的联系，保持信息交互渠道畅通，不断弃旧融新。所以，在进行遗产保护时需要通过各种手段积极恢复工业文化系统与城市整体文化系统的生态廊道，注重工业文化系统内外生态环境培育与建设，时刻关注工业文化与外部环境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输入输出量变化。

武汉工业遗存众多，工业发展史与中国革命史、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等众多文化线索交织，在相同时代与区域背景下，工业遗产与许多著名历史人物参与的有影响的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系。在开放的文化生态环境下，鼓励工业文化物种多样共生，依据历史悠久程度、重大事件相关度及著名人物等指标，整理提取最具地域文脉性和稀缺性的时间片段，可将武汉工业遗产划分为六大文化系列：历史事件（既济水电公司、平和打包厂等）、工人运动与革命（二七纪念馆、施洋烈士陵园等）、城市历史名人（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等）、区域性工业遗产（汉阳、“大冶”等）、工业行业（武钢、武重、裕华纱厂等）、交通运输（京汉铁路及附属设施、大智门火车站等）。依据以上六大主题，确定每个系列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并以此为方向指导该系列中每个单体遗产点的保护，制定切实可行的再利用实施技术，实现工业文化的多样共荣。在执行单个遗产点保护的同时，仍需注意每一类型的工业遗产既要突出相对独立的差异部分，但同时还需强调与其他工业文化系列产生的时空上的重叠交错，注重关联性建设。

3. 修复工业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激发工业遗产新的活力。

在全球化冲击、社会转型以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武汉工业文化从外部环境输入的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大于其输出量，系统结构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内外部环境之间出现失衡状态，突出体现在工业遗产再利用模式偏重单一市场行为而缺乏政府支持的多态势均衡发展。良性的工业文化生态系统具有交互、反馈与自我调节的能力，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与社会需求而进行动态调整，在同一性的前提下维系各种不同功能需求并分配相应生存空间，促使工业遗产达成科学的结构层级、有效的功能组成和良好的社会效益，不断达成新的生态平衡。要克服武汉工业文化出现的匀质化危机，就需坚持动态发展观，以保护为基础积极运用人工干预规律。加强政府主导职能，主动进行工业文化功能和产业空间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将不同的工业文化功能落实到城市空间布局中，进行动态调配，弥补文化类型的断层，推进武汉工业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武汉工业遗产不仅要继承工业传统，还要面对城市的现在和未来。工业文化应在保持生态系统的遗传特性与

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尊重原有工业文化资源，保护传统工业文化核心技术价值的同时，努力寻找与当前社会生产力关系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新的的发展引擎，不断引入先进的思想文化，创造活态的、新兴的、复合的文化载体形式，推动工业文化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异与更新。

在实施技术上，结合武汉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动态更新工业遗产保护范围和名录。工业遗产再利用应坚持保护优先、时序编排、功能置换、复合利用式的改造方法，以文化为发展引擎，寻求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良性接轨，赋予工业遗产与武汉城市发展需求相符合的新功能，将新旧文化元素重组与弥合，激发工业遗产的文化活力。工业遗产的多元化改造首先应由单一性的房地产商业性开发转向以新兴文化产业为重点的方向建设。政府应扶持并引导工业遗产利用与创意产业需求相结合，吸引高素质人才，创造具有文化与经济双重价值的新经济载体，提升武汉文化软实力。如已建成运营的“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2014年获批国家级广告创意园区；建设中的“武昌·长江文化创意设计产业园”也初步显现文创设计产业推动华中地区社会经济发 展的功效。其次，政府还应积极鼓励开展文化事业建设。将工业遗址建筑改建成博览、科普、教育等公共文化场馆，推动城市文化建设，传承工业文脉，提升城市人文吸引力。如已建成的武钢博物馆成为企业文化展示、传播的基地；汉口老客运港改造建成的武汉市科技馆新馆受到市民们的热捧，取得了良好的文化生态效益。再次，政府还应积极鼓励其他模式的再利用，打造具有差别体验意义的工业遗产旅游整体项目、完善工业遗产廊道；同时，还可以通过整合遗址地既有的工业景观元素，融入规划设计手法，建设城市绿地系统中工业遗址生态公园。以上两种改造类型在武汉城市公共空间中还属于空缺状态，亟待改善。以复合类型的工业文化建设为驱动力促进武汉市新的发展，增加城市生活新的体验，修复城市生态环境，同时增加都市创业和就业机会。

4. 完善工业文化生态格局，保持工业文化生态系统的先进性与主动性。

当今我国文化生态的整体格局由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及大众文化构成。“在文化分制格局中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地位并不对等，远没有形成真正的鼎足之势，其中最突出的仍是大众文化的强盛和精英文化的弱小，工具价值甚嚣尘上，人文理性缺席退隐。”^{[6] (p154)}武汉工业文化生态格局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完善工业文化层次结构，是推进武汉工业文化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当务之急。

武汉工业文化生态格局应从调整与控制文化层次结构入手，确立科学合理文化结构建设目标，鼓励和培育先进、优秀、有活力的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来均衡强规约势地位的大众文化，引导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行为健康开展，保持工业文化的先进性与主动性。首先，应不断巩固和加强政府引导的主流文化作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共存。通过工业遗产文化载体生动呈现工人阶级的伟大与劳动的光荣，缅怀几代人持之以恒、不懈奋斗的强国梦想，记录武汉工业化进程中的那些屈辱，铭记“可歌可泣”的事件和人物，弘扬先进文化。其次，精英意识的回归，有助于社会反思所形成的思想交流与反馈，形成浓郁的文化氛围。工业文化应重点扶持以人文话语、理性思考为特征的精英文化，提升工业文化事业建设层面。政府应从物质上、制度上创造宽松条件支持精英文化发展，定期举办讲座、论坛等学术活动，使人们了解工业遗产的内涵，缅怀过去，教育后人，从而更自觉地投入到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来。最后，占有强势地位的大众文化，政府应通过文化政策合理引导，监督改进，严格控制工业文化再利用商品共性的泛滥，加强民众对工业文化多元价值的认知。工业遗产记载了芸芸众生的生活，反映了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工业大众文化在今后应注重理性文化认同感建设，使多种工业文化形态更贴近民众，引发市民的共鸣。

五、启示与思考

工业遗产是武汉近现代社会风貌的一张代表名片。在新时期背景下，武汉工业遗产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复杂问题与重重危机，而文化生态学为武汉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能更有效地保护工业遗产，激发工业遗产新的生命力。实践证明，采用跨学科，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方法，构建武汉工业遗产文化生态系统，能实现城市工业遗产物质空间和工业文化生态的有机结合，使社会历史资源得到善待，工业文化得到继承与创新，城市生态环境得以改善，保持城市的个性魅力和原真记忆。同时，工业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又是一个持续动态变化的社会课题，如何进一步不断深化武汉工业文化生态系统

定位, 完善工业文化生态结构, 拓宽工业文化生态建设方法, 以多元共生的包容态度克服文化危机, 实现武汉工业文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长期共荣, 仍将是下一步规划、管理与建设工作者需要持续思考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刘奇志, 罗巧灵. 武汉市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规划实践探索[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 (5) .

[2] 戴斗勇. 文化生态学论纲[J].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22) .

[3] 江金波. 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 人文地理, 2005, (4) .

[4] 王新跃. 文化生态学理论对城市设计的启示[A]. 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城市规划国际论坛论文集[C].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7.

[5] 姚小玲, 张越. 当前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文化生态维度分析[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6) .

[6] 孙卫卫. 大众文化规约与文化生态培育[J]. 江西社会科学, 2004, (4) .